

生命的漩涡



[叶辛主编]

.....邓家排行最小的丫头

.....陶斯亮找不着“高干子女”的感觉

.....姜文是几点钟的太阳

.....范志毅之妻，空姐还是那个空姐

.....留学生卢刚杀人案的思考

.....农民禹作民

.....罂粟为什么这样红

.....党内第一个见报的右派

.....一位台湾女作家的征婚实录

.....人可以自由的死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叶 辛 主编



生命的漩涡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莉莉
封面装帧 王震坤

·海上文坛丛书·

生命的漩涡

叶 辛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75 插页 3 字数 429,000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 7-208-02842-7/G·476

定价 29.00 元

海上文坛丛书总序

叶 辛

小时候爱读小说。

长大了爱写小说。

从读小说到写小说的漫长的过程中,经历了从都市到偏远蛮荒的乡村、又从乡村到繁华喧嚣的都市这么一段生活。写了小说以后,我才真切地体会到,一些小说是直接印成书出版的,还有一些小说是先在杂志上发表,然后再印出单行本的。

小时候读小说,常常会突发奇想地冲动起来,跃跃欲试地自己也来写一本小说。

长大了写小说,常常抽出闲暇读一点小说,看一看同时代的作家和经典作家们怎么表达,怎么写。

唯独没有想过要当杂志的主编。

但是在我专业地做了五年的职业作家以后,却被任命为杂志社的主编。

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我便以没想当过主编来推诿,不愿担负这重任。

回答仍是很妙的:正因为你从没想过,所以才要你当,要你做一点文化服务工作。天天想着当主编的,不一定能当。

于是我便当上了主编，编的是贵州省的文学刊物《山花》。

走马上任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光明日报》、《文学报》等一些报纸，就发了消息介绍说：国内最年轻的省级文学刊物的主编云云，还配发了照片，似乎挺荣光的。读着报纸上豆腐干大小的一块报道，我意识到干这活儿是有责任的，干就得干好。

一年一年地干下来，干到回归上海。心想这一次总算可以卸去重任了。不料到上海作协报到的第一天，就得到一纸任命，担任《海上文坛》主编。更准确地说，这纸任命在我回来之前已经做好了，我报到那天，只是正式通知我而已。

和《山花》文学月刊不同，《海上文坛》不是一本纯粹发表文学作品的刊物，而是一本贴近生活的、纪实的、反映正在行进中的世界种种生活形态和人物及事件的杂志。

这本杂志应该受到大众的欢迎和好评。

这本杂志应该反映当今社会和世界的热点。

这本杂志应该体现作家协会的水平和格调。

很多人给我描绘这本杂志应该有什么样的脸庞，或者说是应有的内容和形式。

杂志就在文化界、文学界、新闻界、出版界、社科界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编辑部同志们的努力下办起来了。从两个月一期到一个月一期，从办刊初期印数极少的二千册到稳定在数万的订数上徘徊。一晃竟干了七年。

大约从杂志的基本风格定型，订数稳定时起，先后有十几家出版社找过我，商量要把《海上文坛》杂志上的文章，分门别类地编成几本丛书。他们向我介绍出版的形势和市场的趋势，他们预言这样编成的丛书，不但在文化上是有价值的，而且还会在文化市场上受到欢迎。有几家格外迫切的出版社，甚至还说可以在合同上写明头版包印多少万册，有书商愿意包销多少万册云

云。所有这些说法,给了我这么一个印象,就是说《海上文坛》杂志上编发的文章,并没因杂志的时限而过时,把它们结集成书,多少还有些价值。

原先在我心目中,杂志么,过了时限就被称为过期的杂志。在国外,过期的杂志是要颠倒过来置放、降价或削价出售的。每一期新的《海上文坛》出版,隔开几个月,总能在沿海都市或内地大中城市出版的文摘报、周末版、娱乐版、生活类小报上看到转载我们的文章。多的时候,我们一本新出版的杂志,从头到尾所有的文章都被人转了。这些转载的人家,有的懂一点礼貌,给编辑部打一个电话或是发一个短函,不管我们同意与否,算是打过了招呼。但是大量的转载,事前并没有跟我们打过招呼。大概他们觉得,我们转了你的文章,是为你作了宣传,为你办好事哩。其实我们的杂志有自己的风格和品位,我们杂志上登的文章,不一定适合在其他报刊上转载,一转往往会转出一些麻烦来。

办《海上文坛》这七年来,更有甚者,既不打招呼,更不上门来商量,就把杂志上一些文章,自作主张编纂成书,在以书摊为主的二渠道市场上广为发行赚钱。碰巧拿到几本这样的书,且不说纸张、印刷、装订、设计上的质量之差,就是错别字、病句也比比皆是,严重地败坏了我们编辑部的声誉。

有鉴于此,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选编了这一套三本的《海上文坛》丛书,把读者们现在还时常提及和询问到的文章,根据《海上文坛》的逐期专栏,编纂成书,奉献给广大的读者。我特别欣赏《旧照相底片》这本书名。在一个家庭中,闲暇之余,或是家庭某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或是合家难得团聚的佳节,总会翻找出过去几年、十几年的照片,甚至还会找出数十年前祖父母一辈的照片来欣赏品评,寻找岁月的痕迹和往日的记忆,那么读者们在看我们这套丛书的时候,想必也会泛起类似于

翻看家庭保存的相册的心情和滋味。

《海上文坛》作为一本以纪实为基础的杂志，办至七年绝不是说已经办得非常完美了。不，不是这样。正因为她是纪实的，和作家协会其他的纯粹编发文学作品的《收获》、《上海文学》、《萌芽》的不同之处，就是纪实的刊物更容易出差错和纰漏。我们都有这样的常识，同样一件事，比如说公交车上的一场纠纷，即使坐在同一辆车上的乘客，站在不同的角度，所叙述的经过也是会有不同和差别的，有时候由于视角的不同，这种差别还会很大。这个人站在正面说看见他抡起拳头打人了，那个人坐在侧面说我看得清清楚楚，没人动过手……

这就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作为杂志社的主编，我还是愿意将刊物办得更为出色，更为令社会各界人士满意。

愿我们的《海上文坛》越办越好。

愿我们的《海上文坛》丛书走上读者诸君的书架。

目 录

海上文坛丛书总序	叶辛
命运五环旗	1
何鲁丽,有法兰西血统的女市长	2
邓家排行最小的丫头	18
陶斯亮找不着“高干子女”的感觉	26
中国最年轻的数学家	34
丁绍光走过的路	50
中国川妹逼近皮尔·卡丹	66
将“联合国”背在身上的女人	83
姜文是几点钟的太阳	102
马兰,你在忙什么?	118
何智丽对我说	125
范志毅之妻,空姐还是那个空姐	143
丁松母亲等着一个不回家的儿子	153
玉卿嫂之后的爱情故事	169
一撇一捺的许还山	183
摄像机后面的明星们	196
商海风流	209
一个下岗五年的工人当上了老板	210
两个“文化民工”在北京	220

一对夫妇的“个人电影”	231
城市狩猎：一个老板的“钱眼”	239
新型的都市买办	247
玩传销的女人们	259
大款与税款	265
商潮涛声中的北大	275
漩涡中的沉沦	287
从模范到囚犯	288
留学生卢刚杀人案的思考	299
农民禹作敏	322
大墙内的花季	328
一个有罪的孩子与一个孤独的父亲	339
一个年轻女死囚的“最后日子”	355
罂粟为什么这样红	386
走近囚犯	404
精神咖啡	419
岗下的“老三届”	420
第一个见报的右派	438
《奇袭白虎团》奇袭了他	453
我的财富是经历	462
老天要我做人	479
一位留日女博士的生活之路	487
一位台湾女作家的征婚实录	498
张望佛门	520
来自中国权威部门的艾滋病报告	538
急诊室日记	549
人可以自由地死吗？	567



命运五环旗

谁不曾期待过自己鸣奏出生命的华彩的乐章？谁不曾期待过自己的生命因为华彩的乐章而动听？就像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那样辉煌绚烂，就像斯美塔纳的《伏尔塔瓦河》那样波澜壮阔。

让我们看看他们吧，我们将会从他们的每一个乐符中获得启迪，我们将会从他们的生命中感悟意义，我们将会从他们的奋进中体验价值。

当然，还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常常受到舆论的热切关注。他们或许是轰轰烈烈的，他们或许是个性鲜明的，他们或许是豪情满怀的，他们或许是不加掩饰的，他们或许是美丽动人的，他们或许是一鸣惊人的，他们或许是横冲直撞的，他们或许是不拘小节的，他们或许是破釜沉舟的，他们或许是得意忘形的，他们或许是哗众取宠的，他们也或许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他们是谁呢？

她有着一串显赫的头衔：北京市副市长，国民党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她出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副团长。她的父亲何思源是国民党的元老，她的母亲是法国人。本文讲述的是她传奇般的家世和不寻常的人生之旅。

何鲁丽，有法兰西血统的女市长

1988年初，我第一次采访何鲁丽。

那时北京即将召开换届选举的第九届一次市人民代表大会。在十名副市长候选人的名单中，我对何鲁丽发生了兴趣。因为我供职的中国新闻社是专事对外报道的，何鲁丽的背景颇对我们的路子，她是民主党派成员，她的父亲何思源曾任国民党北平市长。在进一步翻看她的介绍材料时，我又发现她的母亲是法国人，这更使我对她的好奇心陡增几分。

乘公共汽车在民族宫那一站下车，向北走，七拐八绕，我找到了西城区人民政府。那时何鲁丽正任这个区的副区长。

后来何鲁丽告诉我，她被选为副区长时，还不认识区政府的大门，也是乘公共汽车，下车后在胡同堆里迷了路，正在犹豫，区政协主席看到了她，说：“何大夫，咱们一块儿走。”

何鲁丽当过二十七年小儿科的大夫，她是在1984年区县基层政府改选时开始弃医从政的。那时提出干部知识化，专业化，配班子还有党外人士和妇女。这次她再上一个台阶，被推举为

副市长候选人,显然也与这几条有关。

走进她的办公室,一个大嗓门儿扑面而来:“哟,是记者同志吧,快请坐,快请坐。”只见一位身材已略微发福的中年妇女麻利地从办公桌旁站起来,普普通通的衣着,满口京片子,再看她的面容,也不大像有外国血统,我竟一下子愣住了。她完全出乎我的想象,以后我从不少人那里得到证实,他们对何鲁丽的第一印象和我有同样的意外。

我一边重新寻找采访的感觉,一边开始了提问,她倒挺爽快,说话开门见山:“我知道为什么选我,女同志,非党人士,知识分子,我是个坐标人物。其实比我能干的人多得是,但既然组织上信任我,我一定努力干好。”

习惯了在医生处方的右下角签名,
当了副区长,却不习惯把自己的
名字写在批文的上端

想当初她当选西城区副区长时就怀着这么一份心气儿。这个区有七十六万人,在北京四个城区中人口最多,何鲁丽分管的工作面宽且杂,从科技、外事、市容、卫生、计划生育到民政。她说:“从大夫到区长,工作性质整个大转变,我得从头适应。”

我问她这几年主要抓了什么工作,她讲了一些听起来挺实在的事,比如整修公共厕所,搞卫生防疫,处理垃圾,解决了四百多名幼儿园保育员的职称,办了全市第一所新婚学校,第一所孕妇学校。尽管有些婆婆妈妈,但给我留下一个鲜明的印象,何鲁丽是个办实事的人。

她很快地就一转话锋,有点儿自嘲地讲起她刚当区长时的

情景：“我两眼一摸黑，什么都不懂。比如在简报上写批文，我写在右下角。办公室主任对我说，老何，这可不是医院的处方啊，意见要写在最上边。”

后来我还是通过采访她的同事得知，何鲁丽很快地适应了副区长的工作，她有一定的行政领导能力，工作作风深入，无论抓哪一件事，她都很认真，不干好决不松手，他们都提到她主持二环路的整治与拆迁：“这条环城马路有 11.6 公里的路段在西城区，由前门到鼓楼一个马蹄形，占整个二环路的 49%，要搬迁 516 户人家。谁都知道，在北京最棘手的事，莫过于搬迁，而且这次军令如山倒，市政府限时限刻完成。我们都替何区长捏把汗。”

何鲁丽那股较真儿劲上来了，她不惜力，一趟趟地挨家挨户做工作，到了西便门最后剩下几十户，她每家都去了不止一次，有时微服私访，作了许多磨合工作，解决了不少扯皮的事，终于按期完成了任务，这条路两旁变得清清爽爽，绿荫成行。

当我再三追问她这段工作的细节时，她用一個比喻溜之大吉：“就像一首交响乐呗。有快有慢，起伏变化挺大，但最后总有个昂扬的终曲呀。”记得那次采访临近结束，她还在感慨自己的不足：“我受经历的限制，过去接触面窄，工作的思路，尤其是改革的思路不清晰，不大胆。”她的办公室里放着六七盆绿叶植物。我顺口问了一句：“您喜欢花？”

她说：“喜欢。不过这里只能养点绿叶儿，它们皮实，好活。”她指着其中的一盆枝叶繁茂的金铃葵告诉我，“这是一个老病员送给我的。”

何鲁丽当了副区长以后，很长时间还坚持每周一次门诊，她说：“我喜欢我的专业，况且在小小的诊桌上也能看到历史的进步，我作实习大夫时，接触到的儿童病种净是麻疹合并肺炎，中

毒性痢疾，流行性脑膜炎，而现在我带大学生实习，想找一个麻疹患儿作病例都难找了，来看病的孩子中却出现了富裕病肥胖症。”

那次采访在拉家常般的谈话中进行，其气氛和内容始终没有解开我心中那个疑团：她怎么一点儿也不像我想象中的何鲁丽呢？于是在与她告别的时候，我冒冒失失地问了一句：“你母亲真的是法国人？”

她点了点头。

八岁以前，她是从照片上认识父亲的，
她以为父亲是一位老师

几天之后，她当选北京市副市长。我又一次采访了她。这次是在她的家里，朝阳区建国门外安西里。两居室普通的单元宿舍，窄窄的过道里堆满了杂物。她和丈夫住在里间，两个儿子住外屋，好在大儿子上大学住校平常不回家，否则外屋真有些转不开身子。看到她和丈夫的卧室，我心里一动：两张单人床，罩着蓝白条床单，这个生活细节倒满西方化的，不像一般中国式的人家，两口子一张大床，被子，枕头，或者叠成块儿，或者落成条儿，暴露在外。

我看到了一张照片，1957年大学毕业时的何鲁丽，浓眉大眼，梳着两条粗粗的大辫子，像一位漂亮的维吾尔族姑娘。接着又看到她上高中一年级时的一张小照片，那模样俨然是一个地道的外国小女孩子。于是透过岁月的流逝，我终于找到了何鲁丽那一半的法兰西血统。回转身再仔细端详她，白晰的皮肤，微髻的头发，昔日的洋气在至今秀丽的眉目间依稀可辨。

她告诉我,从结婚起,她就住在这套单元。旁边的单元原来住着她的双亲。她屋里留着父母的一件遗物,那是一只老式的落地书柜,柜门的玻璃没有了,用白报纸仔细地糊着,她说“‘文化大革命’抄家时全给砸烂了。”

这次采访,她详细地给我讲述了她的父亲。

历史有时会出现这样富有戏剧性的巧合:1946年秋天何思源走马上任北平市长,四十二年以后,他的女儿当选这座城市的副市长。何鲁丽说:“父亲绝对不会想到我会从政,到了晚年,他更觉得我当大夫挺合适。况且他多少有点儿重男轻女,认为女孩子成不了大事。”

何思源,山东菏泽人。本是一介书生。从1919年初,他即开始了长达七年的留学生涯,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攻读经济学、哲学。由于他家境贫寒,在国外靠半工半读维持学业。有时在饭馆洗碟洗碗,有时在农场里干季节工。当他到德国求学时,这个国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萧条期,何思源租住的房间冬天没有火炉,只能在临睡前请房东太太用长把熨斗把被子熨热以度严寒。但何思源读书勤奋刻苦,终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何鲁丽记得父亲喜爱达尔文的一句格言,大意是:我从不把半小时看作微不足道的时间。她说:“这是父亲求学时悟出的道理。”

1927年何思源回国,正逢中国民主革命兴起之时,他毅然投笔从戎,在广州参加北伐,担任过政治部副主任,后随军到了山东。1929年何思源出任国民革命政府山东省教育厅长,民政厅长,1944年任山东省政府主席。

在家乡的土地上,何思源实践了他教育救国的主张,他努力兴办地方教育,鼓励私人办学,尤其重视师范教育。他主政山东

教育事业十余年，创办了八所大学。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何思源随山东省政府不断转移，与妻儿分开了。何鲁丽三岁到八岁没有见过父亲，母亲带着他们住在天津英租界。珍珠港事件以后，又搬家到意大利租界，但没住多久，日本人就把她的母亲抓起来，押着一家五口人到山东惠民一带，妄图以扣押家属迫使何思源投降南京伪政权。此行何鲁丽没有见到父亲，日本人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何家又回到了天津。何鲁丽说：“母亲认为天津租界住不下去了，她带着我们经过多方辗转，到了山东临朐，我这才见到了父亲。我记得是在秋天，哥哥说是在春天。”

何鲁丽在八岁以前，是从母亲珍藏的几张照片上认识父亲的：瘦高的个子，面目清秀，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她常常猜想父亲一定是一位老师吧。

1946年何思源在学生们反饥饿反内战的呼喊声中接任北平市市长。五四时期他本是学生运动中的一员。现在他站到了学生的对立面。这种现实使他痛苦，也使他觉醒。1948年夏天，国民党免去了何思源的职务，据说美国有位叫魏德曼的将军曾对蒋介石说：“你怎么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地方用有这么一种思想的人？”

在华北战局已经明朗、共产党兵临城下之际，何思源面对几种选择。他可以在南京方面继续谋个官职，国民党任命他为徐州剿总委员；他可以去台湾，东单机场给他留着航机座位；他也可以随法国籍的夫人携子女出国，法国领事馆为他们办好了手续。但是他哪儿都没去，他留下来，为和平解放北平奔走。他告诉家人：“我这一生走过的路上有不少错误，现在人民盼望解放，盼望和平，我不能再错下去了。”

何思源为这个选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包括失去了一个他

所钟爱的小女儿。何鲁丽说：“妹妹鲁美替父亲送了命。”1949年1月17日夜里，国民党特务在何家居住的锡拉胡同49号安了两枚定时炸弹。第一枚在何鲁丽和妹妹住的厢房炸响，妹妹当场身亡，何鲁丽被埋在炸塌的瓦砾里。何思源夫妇急忙起身奔向厢房，身后的卧室轰地又炸塌了。何鲁丽说：“母亲动作慢点儿，伤势较重，包括头部和手，父亲被炸伤了一只胳膊。”

国民党特务的这两颗炸弹没有吓退何思源，反而坚定了他追求真理与正义的信念。两天以后，他作为北平人民的十一个代表之一，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为保护这座五朝古都立下了功劳。

十四岁的何鲁丽和父母一起经历了这场生死的考验。因此四十多年后当她就任北京市副市长时，她比一般人更多地体验到一种沉重的历史感，这座城市与她的家庭息息相关。她多次讲过，我对北京城有感情，我好像和它一起成长。当我的工作与生活融进北京跳动的脉搏里，我就感到无限的欣慰！

1989年1月，市领导去看望北京市第一任市长聂荣臻元帅。何鲁丽也去了。市委书记李锡铭向聂帅介绍：“这是故人之女。”聂帅立即回答：“何思源的女儿吧。”

何鲁丽说：“父亲参加谈判时，与聂帅、叶帅，还有莫文骅将军都有过交往。”

北京曾出现过几十例霍乱，在不动声色之中，何鲁丽熟练地指挥部下把这场可能引起的乱子弹压下去

何鲁丽进入市政府大院以后，我和她见面的机会多起来，作